

由合作到对抗: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青年党的关系演变

王 雪 超

〔摘要〕中国青年党是国民革命时期除国、共外的第三大政党。国民革命初期,在法国的中共旅欧支部与同属革命阵营的青年党实现了低限度的合作。青年党于 1924 年移师回国后,共、青两党也都曾有寻求合作的言论和行动。然而,由于两党政治主张、革命策略的不可调和以及青年党的在国民革命中的“不行动”,导致了中共将青年党定位为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两党关系也因之逐渐恶化。国民革命后期,为了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共、青两党关系升级为主义、组织与活动上的全面对抗。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国民革命

〔中图分类号〕D231; K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4-0057-10

From Cooperation to Confront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Wang Xuechao

Abstract: Besides the Chinese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ese Youth Party is the third largest party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branch of the CCP. and CYP. are both in the Revolutionary Camp ,they implementing low limit cooperation. After CYP. Return China in 1924 ,they had speeches and actions of seeking cooperation. However ,because their revolutionary tactics are difficult to be reconciled and the CYP. 's no acting in revolutionary ,CCP. began to orient CYP. As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Squirearchy and Comprador classes ,so that ,their relationship increasingly began worse. In the later perio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order to seizing the leadership power of the revolutionary ,They for striving for leadership ,they upgraded to all-round confrontation by doctrine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ies.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时期的党派关系,尤其是国共关系一直为学界研究热点,这与国共两党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且后来都建立了全国政权不无关系。然而,当时在国共两党之外,还活跃着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口号的中国青年党^①。青年党成立于法国,1924 年 7 月移师国内后一度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该党不仅参与了国民革命,而且与中共的关系经历了由合作到对抗的演变。

目前,学界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青年党的关系问题关注较少,偶有涉及,也多偏重于

中共与青年党的思想论争^②。王奇生和吕芳上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该时期国、共、青三党的关系

① 中国青年党于 1929 年才公开党名,之前称国家主义派或醒狮派。

② 详见李义彬《国家主义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活动》,《历史研究》1965 年第 5 期;韩凌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齐鲁学刊》1979 年第 2 期;赵德教《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思想批判》,《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3 年第 S1 期(增刊);侯建明《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争》,《长白学刊》2008 年第 2 期。

予以了较为详细的论述^①，但对中共与青年党的关系均仅限于粗线条的描述。至于两者关系演变的内在原因，两人更是着墨甚少。中共与青年党诸多领导人^②同源於少年中国学会，虽主义信仰、政治分野不同，但都属于革命阵营。然而，为何同属革命阵营的中共与青年党，非但没有实现合作，而且还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两党关系愈加恶化，几至水火不容的地步？由此，本文特就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青年党的关系进行考察和探讨，以求对上述问题有所澄清。

一、寻求合作

本来，中共在成立之初，特别强调自身的“无产阶级性”，宣称要“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③。后因自身力量的弱小、革命形势的需要以及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逐渐接受和确定了与国内各“革新党派”进行合作的方针。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并计划“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④。中共三大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同在法国的国民党员王京歧取得联系，商议两党合作问题，并于1923年6月16日达成协议。这样，旅欧共青团70多名团员（党员都是团员）全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中共旅欧支部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也于同年11月在法国成立。

当时，青年党尚未成立，其成员因鼓吹国家主义而被称为国家主义者。在中共未成立前，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曾就“主义”问题在《少年中国》杂志上有过争论，但只限于学理性的争论，两派会友间依然保持着友谊关系。当国共两党确定要建立合作关系之后，在法国家主义者颇为不满，多次发表文章反对“联俄容共”。自1923年底中国青年党成立后，中共与青年党更是以《赤光》和《先声》为阵地，

就“主义”与革命策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法的中共旅欧支部与青年党诸多领导人本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虽各自主义信仰不同，但所在两党毕竟都属“革命政党”，有着共同的敌人^⑤。而且，两党正式成立前，留法的共产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曾在1921年的“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进驻里昂大学”及在“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斗争中，有过言论或行动上的合作。因此，在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中共旅欧支部也在考察同青年党建立合作的可能性。1924年3月22日，李富春、刘伯庄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此党（指青年党——引者注）为新组织的政党，其首领为曾琦、李璜、何鲁之（均少年中国学会的）、张子柱等。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号召，以暗杀为手段，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反对我们亦反对国民党”，其“虽立意在出风头，独创势力，但尚有革命性。因之我们对之表面上除以言论批评外，于国民革命的战线上，仍希望其能于行动上尽可能的连（联）合去引导他们。”^⑥此时，曾琦也主张“劝新党联合以向旧党作战”，但“仍保其独立之性质与特殊之主张，不必混入他党，失却光明之态度”^⑦。由此，双方在党派合作一

① 王奇生从“革命话语”的视角论述了国民革命时期国、共、青三党党际关系的分合互动。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台湾学者吕芳上则侧重描述了国、共、青三党在这一时期对“学权”的争夺。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263—305页。

② 中共方面有：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刘仁静、杨贤江、沈泽民、张闻天等；青年党方面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6页。

⑤ 中共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口号；青年党则以国家主义为信仰，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口号。

⑥ 李富春、刘伯庄《向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3月22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⑦ 《曾琦先生文集》（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395页。

事上态度都很明确，都主张革命性质的政党应该联合在同一战线上，以对付国内外的敌人，只是各自所主张的合作方式不同而已。

既然如此，中共与青年党便有了建立合作之可能。1924年5月底，周恩来约李璜及张子柱面谈。周恩来指出“目前国内新党联合，要实行革命救国，我们大家虽然思想主张不同，然而要打倒军阀政权，反对列强侵略，这是一致的。我们在此打下去，殊无多大意思，不如我们三党（指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及在法的中国国民党——引者注）来一个停战协定，从此不要再打而仍如以前的合作。”会谈结束后，张子柱将此意见转告曾琦。曾琦考虑到“青年党在法、德、比三地发展，已得党员一百二、三十人，难于再事扩张”，故有意回国活动；且由于青年党在法“只有稳健的发展，也不宜长此与中共打下去”，遂与周恩来等人约定，定期会面，订立休战协定。^①1924年6月7日，曾琦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任卓宣，国民党代表习文德、李富春（时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引者注）及本党人员张星翰（张历生）等开会，商议新党联络办法，订立规约十条，共以“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宗旨，彼此不得互相攻击。^②

至此，中共与青年党的合作前景一时显得比较乐观。1924年7月，因国民革命发展需要，周恩来返回国内。同月，青年党的领袖曾琦、李璜也由法归国。曾琦回国的志向，即为“从主义与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期之三年，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同志，站住脚后，然后再将青年党公开出来，以与国共两党相周旋”^③。显然，曾琦的长远规划就是先立足，再凭势与国、共竞争。

1924年10月，曾琦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大肆鼓吹国家主义，批评共产主义及“联俄容共”政策，而中共一方则以《中国青年》《向导》《政治周报》《政治生活》等刊物为阵地予以还击^④。虽然中共与青年党一直存在主义及革命策略上的争论，但两党并不否认对方的“革命性”，所以两党一面展开大规模的笔战，

一面也在思考着彼此合作的可能性。

国共合作建立前后，曾琦曾对党派合作问题作过思考。他认为青年党不能仿效中共，不应该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其他党合作。在一次致友人的信中，他表示“窃以为凡人欲加入某党，必须对于该党之‘主义’，‘主张’，‘手段’，‘方略’，‘态度’，‘纪律’皆完全赞成，方能加入……若仅以主义相同之故，便须隶于一党，则英美诸国政党除‘无政府党’与‘共产党’外，其他各党，无不立于‘国家主义’之下，彼等何为而各自独立以相竞争耶？”^⑤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也感觉到国内党派有合作的必要，认为“以为我国今日所处境地……乃‘各党合作’之时，而非‘各党互斗’之日”。因此，他提出了“神圣联合”和“新党联合”的主张“凡主义不同，主张不合之党，皆可各保持其组织，特于某一时期，某一事件，各党协商一共同之意见，而各竭尽全力以相助。如此，则既无妨于各党鲜明之旗帜，又可以救共同托命之祖国”，在此基础上，青年党愿“与国民党及其他爱国团体实行‘神圣联合’，以‘一致对外’”。但同时，他又强调：此“神圣联合”并非“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参杂混合”，而对于国民党，只有“放弃其联军阀之政策”，青年党才“对内亦可一致进行革命”。^⑥

曾琦这一含有“党外合作”建议的“神圣联合”主张在当时条件下并无多少可行性，但这多少展现出青年党期望党派合作的主动姿态。中共当时亦做过争取青年党高层的工作，恽代英和邓中夏就曾邀请左舜生在《向导》和《中国青年》上写过文章。而左舜生也曾表示有加

① 李璜《中国青年党之诞生》，《传记文学》（台北）第17卷第3期。

② 《曾琦先生文集》（下），第1403页。

③ 李璜《回国任教与对当时学术界的观察（1924—1926）》，《传记文学》（台北）第21卷第5期。

④ 据学者统计，中共党人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批评国家主义的文章达80多篇。

⑤ 《曾琦先生文集》（中），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683—684页。

⑥ 《曾琦先生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20—121页。

入国民党的冲动，只因找不到适当的介绍人而作罢。^① 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第六届年会后，作为会友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刘仁静、杨贤江等人来到醒狮周报社，要求青年党“停止攻击国民党之联俄容共”，并邀请他们一同加入国民党^②。双方从早晨7点钟，一直谈到吃过晚饭，“初时尚作客气姿态，辩论政策问题……双方争至激烈时，拳不停挥，口沫四溅，各以杀头相威胁，当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③。最终，“两方的论点，到底无法接近”。临别离去时，邓中夏留言“好！以后我们相见于疆场之上吧！”^④ 两党此次谈论不欢而散，显示出彼此在主义及现实策略上的矛盾难以弥合。虽然此后中共并没有完全放弃寻求与青年党合作的意图，但更多地发起了对青年党的言论攻击，尤其是对青年党在国民革命中“不行动”的攻击。

1924年11月22日，曾琦在致郑伯奇的信中谈及共、青关系时，曾有过如下论述“国内共产一派之青年既加入国民党而实行‘国民革命’，在理宜与吾辈无冲突，故不佞在欧尝倡‘神圣联合’之说，盖以彼此明明尚有共同之大敌在前，即军阀列强是也，乃彼等对于国家主义仍日肆攻击，竭力诋诬，一若军阀可恕，官僚可赦，政客可追，而爱国派不容稍宽者！呜呼！匹夫有罪，爱国其罪，党见如此，奈之何哉！亦惟有‘各行其是’而已。”^⑤

由此可见，曾琦将共、青两党“各行其是”的原因归结于“党见”，即两党的主义及革命策略。事实上，两党“党见”始终就存在分歧，然则为何在法国时尚能实现低限度的合作，而到国民革命开始后，两党关系却急转直下呢？因此，在“党见”之外，当另有他因。

二、正式决裂

政党是一定阶级和集团利益的代表，党际关系的确定必须以各自的利益和客观情况作为考量。共、青均是20世纪20年代新兴起的政党，与民国初年的政党相比，“主义立党”是其显著特征。所谓“主义”可以视作某种意识形

态或理论主张的高度概括。政党的主义不同，审视社会的立场与角度就会存在差异。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提及政党间主义之差别，就不能不涉及苏俄因素。众所周知，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同时“联俄”也是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新三民主义中的关键一条。但是，同样以革命自居的青年党却对“联俄”一策颇为反对。

在青年党人国家主义的革命观中，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美、日、英、德等帝国主义是白色帝国主义，而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苏俄则是赤色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只是“苏维埃政府用以征服弱小民族的一种御用机关而已”^⑥。而苏俄向中国输出“世界革命”的价值观，也只是基于外交策略的需要，目的是利用世界无产阶级与苏俄的敌人——帝国主义进行“冲锋”与“决战”，以此来打破十月革命后苏俄在国际间被孤立的窘境。“冲锋”与“决战”若败，“至多只是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吃亏”；若胜，“俄国便可实现赤色帝国主义的好梦，称霸世界”。^⑦ 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共，在青年党人眼中，不啻为“苏俄之驻华办事处”。中共的“联俄”只会“引狼入室”、“授人以柄”^⑧，甚至会促成一切帝国主义的联合压迫，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境地。简言之，在青年党人的革命观中，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的代

① 左舜生自认为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且根本不会对任何主义发生迷信，其最后加入青年党，也只是“一种朋友关系的偶然”。参见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70页。

② 李璜《内争不已，外患方殷（1928—1931）》，《传记文学》（台北）第22卷第3期。

③ 周宝山编《左舜生先生纪念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④ 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7—8页。

⑤ 《曾琦先生文集》（中），第679页。

⑥ 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98页。

⑦ 陈启天《反俄与反共》，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⑧ 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104页。

反俄必须反对国共两党的联俄政策，就成为青年党人国家主义革命观逻辑推演的自然产物。

在中共一方，自从1923年三大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后，该词便具有明确的革命指向，即“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在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中，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存在包含与递进的关系：国民革命“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要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国主义的势力”；国民革命胜利之后，“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①。可以说，国民革命在当时不仅是一种宣传口号，更是中共革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青年党反对“联俄”，表面上是对中共革命策略的否定，实质也是对中共革命合法性的质疑。而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革命观出发，既然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共同敌人都包括了帝国主义，则帝国主义当然最恐惧中华民族与苏俄的联合战线。因此，如果沿着中共的共产主义革命观来推论的话，反对世界革命、反对联俄的青年党自然就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联合战线之组成部分。由此，反对青年党也成为中共革命事业之必需。

可以看到“联俄”与“反俄”分别是中共与青年党从自身主义推演出的现实革命策略，革命策略的截然相对又导致两党缺乏合作的现实政治基础。而必须指出的是：两党在革命策略上的针锋相对只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必要条件，而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则使双方在合作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开始后，中共深入学校、田间、工厂，鼓动学生、农民、工人起来参与革命。尤其五卅惨案发生后，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由学生、工人、农民等各阶层参与的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当时，中共将五卅运动看做是“民族自决反抗外力的第一声”，而这一切，“皆由于实际运动而来”。^②

当各阶层民众积极参与五卅运动之际，青年党虽然发表了几篇反帝的文章，却没有更多

的实际行动。他们的“不行动”^③引起了中共的不满。但虑及以往的情谊，萧楚女仍旧以朋友的名义公开劝说青年党人要“从此丢开坐而论道的‘笔’，脱下西装，走出洋房和大学讲堂”，来“和我們来做基本工作”。^④1925年冬至1926年初，北京、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相继爆发了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为联合全国反奉力量，中共号召孤军社和醒狮社（青年党组织——引者注）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奉系军阀，建立人民政府。中共指出“我们自信都是为被压迫的中国人的利益奋斗的。虽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彼此不能相互谅解，然而我们都是希望中国早日达到自由的地位……所以我们相信，若是我们的实际行动与表面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在许多时候与地方，还是可以有一致的动作。”^⑤在中共公开表示出合作意图后，青年党的回应却颇令中共失望。青年党认为中共“一面漫骂人，又一面劝人‘捐除成见’，与他要好，显然是一种愚弄他人的‘政客手段’”；还批评中共联合反奉军阀打倒军阀只是“徒使国民多一番牺牲而已”；并认为若要根本打倒军阀，“不能利用军阀来打军阀，而须多做点‘宣传和教育工作’，唤起人民的觉悟，促进人民的团结，然后能运用人民的自力，以铲除一切国贼”；最后还提出了与中共合作的六项条件，包括了（一）停止攻击国家主义；（二）停止宣传共产主义；（三）停止拥军阀以倒军阀的恶手段；（四）停止假借外力增长内乱；（五）拒受俄国贿赂；（六）驱逐俄人鲍罗廷及加伦，以表示诚意”。

① 《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4—465页。

② 伏之、楚女《对于国家主义的一个观察》，《中国青年》第83期。

③ 从中共立场言，可以看做“不行动”；从青年党立场言，意味着由于革命策略的差异，从而不参与中共的行动。

④ 楚女《谁叫醒狮派人学李汉俊》，《中国青年》第86期，1925年8月1日。

⑤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孤军社醒狮社诸君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中国青年》第107期，1926年1月4日。

如其不然，“不但不能与他们‘一致动作’，而且不可参加他们的‘行动’，做他们策略的牺牲”。^①

显然，青年党提出的六项条件渗透着其“反俄”的革命观。对于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不能接受，转而指责青年党只是“爱用空洞洞的‘爱国’两字牺牲国内弱小民族与被压迫阶级的实际利益”，“藉口做宣传教育工作，避开一切实际战斗”，而“决不肯想个甚么切实方法（做）点甚么实际行动”，“他们所谓‘爱国’本只是骗人，所以他们在任何时间，决不感合作的需要。他们表面是一个主张——国家主义，里面又是一个主张——藉个名色为自己造地位抢饭碗，而一方以反共产及诬蔑革命民众献媚于帝国主义者，军阀、名流、学者、绅士、大商买办”。因此，中共提出：要联合不愿受资本家地主压制的农工，“在最短期间，组织人民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用合当的政策引中国到没有资本家地主存在余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我们要打倒一切妨害中国到这个路上去的反动派”。^② 1926年3月，北京“三一八血案”发生后，共青团以上海学生总会的名义再邀青年党参加反段（祺瑞）市民大会，仍被拒绝。同年9月5日，四川发生“万县惨案”，上海学生会邀请曾琦参加各团体讨论“万县惨案”的会议。曾琦则以“这是共产党的运动，我们不参加”为由，再次予以拒绝。^③ 中共随即对青年党发起攻击，指出“他们的行动和言论告诉我们：中国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任务并不在‘外抗强权’，只在攻击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锋中国民族革命的友军苏俄；并不在‘内除国贼’，只在攻击中国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④ 陈独秀则径直称青年党为“不行动的党”，认为“象这样一个不行动的党，似乎用不着别人再去批评他了”^⑤。经过这几次的邀请与被拒绝，中共对与青年党合作的前景由“希望”彻底转向了“失望”。

应该说，青年党对中共邀请共同参与行动的冷淡回应，是青年党的国家主义革命观以及现实革命策略的结果，中共也因此逐渐对两党

合作，哪怕只是行动上的联合，不再抱有希望。但此时，中共对青年党的批评虽然不无激烈言论，却大体仍能以友人相称，表示两党关系尚未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如果说在“行动的时代”（罗志田语）的“不行动”使得青年党一方主动与中共渐行渐远的话，中共对青年党逐渐清晰的阶级定位则将其推到了“敌人”的位置上。

正如毛泽东所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⑥。中共对其他政党的阶级定位直接影响了其党派政策。以马列主义立党的中共，在整个国民革命时期，始终以阶级分析法来审视革命过程及革命中的各个政党。

依据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时代“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⑦。沿用这种分析方法，中共在建党之初就将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并提出：“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⑧ 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在二大上肯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尚具“革命性”，“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⑨。在三大上，中共决定与被自己视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进行合作。而在此时，中共对青年党却没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只是强调其“尚有革命性”、“并不否认资本主义”。这种认识也是中共早期寻求与青年党

① 《答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告爱国同胞》，《醒狮周报》第62期，1925年12月12日。

② 《评醒狮社孤军社的回响》，《中国青年》第107期，1926年1月4日。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87页。

④ 超麟《替段祺瑞辩护之国家主义者》，《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⑤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16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1—62页。

合作的原因所在。然而，随着中共对资产阶级认知的深化与青年党革命态度的变化，中共将青年党逐渐定位为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

本来，从中共的阶级分析观念出发，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但因天生具有“依附性”和“妥协性”的特点，其革命性并不彻底，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情况下甚至会表现出“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一面。1923年，陈独秀就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与非革命的三类。不过，这种划分只是他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国共合作的理论思考。此时，他尚未对青年党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国民革命开始后，面对青年党的“反俄”与反对国民革命的舆论批评，中共也只是指责青年党“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认为即使“假定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然而中国革命既有各阶级合作的必要，则使他们能努力革命，至少亦是我们在向帝国主义作战时的伴侣”，“我们愿意与一切革命的党派合作，但我们希望他们革命，不愿看见他们把革命的事业放下，反转只顾和比较革命的人为难”。^①可见，中共已有了将青年党归类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倾向，并且开始质疑他们的革命态度。

五卅运动是中共对资产阶级认识变化的转折点。在运动中，资产阶级态度，由前期的同情、支持转变为与西方列强妥协、拒绝援助工人。在共产党人看来，这无疑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充分暴露，是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准备联合起来的表现。

早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就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妥协性”的充分暴露，更是让中共意识到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必要性。瞿秋白在对五四至五卅时期革命思潮及国民革命运动的阶级进行分析时指出：五卅运动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而“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

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权利……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同时“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这种运动的彻底发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对所谓赤化苏联的宣传，离间挑拨资产阶级”，而青年党对国家主义的宣传就是“资产阶级发现自己的‘阶级觉悟’”的表征，青年党和国民党右派的兴起，也只是“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目的就在于使资产阶级“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导权”。^②这里，他已经明确将青年党定位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将国家主义的兴起视作与中共进行革命思想指导权的争夺。帝国主义与军阀是中共革命的对象，而他把青年党与帝国主义、军阀相并列的提法，无疑是将青年党摆到了革命对象的位置上。

五卅运动为中共从革命态度角度区分不同群体的阶级属性提供了实际经验。因此，在运动过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特别强调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时青年党在实际行动中的“不行动”，尤其是其与国民党右派的“过分亲密”，^③最终导致中共将其定位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1925年12月，毛泽东根据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革命态度，将资产阶级划分为三种：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二是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三是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阶层。其中，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而其政治代表则是青年党与国民党右派。^④

① 《恽代英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65—667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460—462页。

③ 国民党上海中央执行部在1925年夏至1926年1月间为国民党右派所控制，与青年党一度有在“反赤”的口号下共同合作之意，后因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对而作罢。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5页。

至此，中共对青年党的阶级定位由模糊逐渐走向清晰，由在法国时的“尚有革命性”、“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到“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转为帝国主义的“灰色”的工具，最后明确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这种称谓的变化折射出了共、青两党的关系演变。对中共来说，青年党已经从先前的“朋友”演变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成为“反革命派”。既然中共视青年党为“反革命派”，则双方的对抗就日益不可避免。

三、全面对抗

从1925年底开始，中国政治思想界呈现急剧分化的态势，如时人所指出，“在每个革命行动，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行动中，只能容许你选择一个意见，或者革命或者反革命”^①。而伴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推进，国内各党派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反映在共、青关系上，则是合作无望后，双方在主义、组织及活动方面对抗的全面升级。

在中共方面，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就曾发布中央通告，指出“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要的地位。”^②12月，谈到共、青两党的争论时，刘仁静也认为“两派争论的重心，是一革命的策略问题”，而“争论的中心是谁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③。

青年党人起初虽对政党鼓动学潮以自利，颇不以为然，而对藉教育问题推波助澜，扩大党势，也深以为恶^④，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特殊时代的青年，有其特殊的使命，组织民众是全民革命与全民政治的基本工作，青年学生是民众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的组训也就不可少了^⑤。后来，在青年党人的努力下，各地国家主义团体相继组织起来。1925年10月，国家主义青年团成立。1925年冬，青年党党部由巴黎移至上海。1926年7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最为重要的工

作就是组织系统的完善，青年党建立了由上到下的中央党部、省（特别市）党部、县（市）党部、区（乡）分党部等整套组织系统，进一步加强了实力，并为党务发展及与中共相抗衡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6年7月，在国民革命军即将北伐的前夕，共青团在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将国家主义归入“反革命”之列。决议案指出“国家主义虽然在思想上代表中国士绅之自大与排外主义，但是国家主义派的行动与言论，客观上自然而然被买办阶级所利用以为反俄反共之工具。这种主义可以蒙蔽社会上一般落后分子，因为他用类似民族主义的口号做反革命宣传，他本是旧统治阶级的思想，根本与工农的革命势力不能相容。所以实际上他们只反对工农革命势力的发展（所谓内除国贼，只是反共），及反对世界无产阶级与中国平民联合战线（所谓外抗列强，只是反对苏联）。因此国家主义在言动上只是买办阶级的一个反革命工具。”^⑥这样，中共就以决议案的形式将青年党的“反革命”身份规定下来。此后，双方开始进入主义、组织与活动全面对抗的阶段。

北伐开始后，青年党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1926年10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命令，指出“查近年一般思想落后之徒，结成所谓国家主义派，甘受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官僚豢养，对于本党主义及国民政府之设

① 仁静 《告国家主义的青年》，《中国青年》第104期，1925年12月6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25页。

③ 仁静 《告国家主义的青年》，《中国青年》第104期，1925年12月6日。

④ 参见靖涛 《教育界之混乱》，《醒狮周报》第25期，1925年3月28日。岫云 《共产党摧残广东教育之阴谋》，《醒狮周报》第47期，1925年8月9日。舜生 《共产党破坏全国教育》，《醒狮周报》第50期，1925年8月29日。

⑤ 参见陈启天 《我们青年的使命与工作》，《醒狮周报》第73期，1926年3月6日。

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文件》（1926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内部刊行，1957年，第203页。

施，日事诬蔑破坏……训各级党部、党报一致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并摘出各项通令查照，希一奉到此令，即对该派开始攻击，或演说宣传，务使人民视听正确，邪说日就销灭，是为至要。”^①之后，先是广东、湖南、湖北地区的《醒狮周报》被禁，接着，醒狮日报社亦被查抄，并有10余人被拘捕，《醒狮周报》几乎因此而中断。从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国共两党关闭了青年党在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10余所学校，报纸20余种，上百青年党党员被拘禁，甚至被杀。^②

在青年党看来，中共视其如“眼中钉”和“背上刺”，“必欲去之而后快”^③。因此，也自然是针锋相对，陈启天就宣称：要“用适当的主义打倒共产党的主义，用严明的组织打倒共产党的组织，用在青年、农工和军人中的实际活动打倒共产党的活动”^④。

两党对抗最激烈之处当属对青年学生群体的争夺。据阳翰笙回忆：“当时（指五卅运动时——引者注）国家主义派和我们争夺青年，在上海、南京一带活动很厉害，我们和他们的斗争非常激烈。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受帝国主义豢养的、凶相毕露的国家主义派，我们作了大量准备。凡是曾琦、李璜、余家菊、左舜生常去活动的地方，我们也在那里作好布置，和他们唱对台戏。他们的人一讲完，我们就立即有人接上去讲，针锋相对，逐条批驳。经常在这种场合出现的，不是恽代英，就是萧楚女。恽代英亦庄亦谐地批判他们，萧楚女嬉笑怒骂地驳斥他们。”^⑤不惟面对面的争论和辩驳，两党也发生了直接冲突。1926年6月13日，青年党人陈启天应邀到武昌中华大学演讲“中国教育政策”。中途，共、青党员发生肢体冲突，导致多人受伤，直到警察赶到，才制止了事件的扩大。事后，双方各执一词，青年党指责中共“蓄意闹场”^⑥，而中共则认为青年党有意陷害“革命青年”^⑦。

除争“学权”外，两党还在上海展开了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争夺。1926年下半年，随着

北伐的胜利推进，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热烈高涨。曾琦认为必须打进工人阶级内部去，才能阻遏北伐的发展，并主张从帮助工人学文化、办夜校入手。11月，青年党在上海沪西区大夏大学附近开办工人夜校，以图在工人阶级群体中培养青年党的势力。此举当然引起了中共的警惕。不久，两党对工人的争夺日益升级，出现武力争斗，甚至流血事件。^⑧

可见，随着北伐的进行，两党间的争论已经发展为全方位的冲突，甚至越出了正常的党派竞争范围。然而，自1927年国民党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的活动逐渐转入地下，并逐渐将主要力量退到农村。与此同时，青年党也因国民党的“清党”政策而日渐陷入困境，组织也开始涣散。如时人所言，“平日讲国家主义的人或团体，有倒戈者，有溃散者、有退缩者，甚至有三跪九叩以献降表者。”^⑨此后，两党的关系进入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

四、余 论

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型政党的全面崛起，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新时代。1921年中共的成立，1923年青年党的组建，以及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都是这一现象的表征。

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革命对象都

- ① 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3—54页。
- ② 参见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63页。
- ③ 《曾琦先生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73页。
- ④ 陈启天《反俄与反共》，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62—63页。
- ⑤ 《阳翰笙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44页。
- ⑥ 陈启天《为共产党捣毁武昌中华大学事告全国青年》，《醒狮周报》第89期，1926年6月27日。
- ⑦ 超麟《武昌中华大学武剧中国家主义者的构陷》，《向导》第159期，1926年6月23日。
- ⑧ 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83—85页。
- ⑨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第305页。

指向帝国主义与军阀，缘何国、共实现了合作，而共、青却渐行渐远？对比国、共的成功合作，或可对我们理解共、青寻求合作的夭折有些助益。

在革命策略上，国、共有关于“联俄”的相同理念。孙中山在革命屡次受挫后，确立了“以俄为师”的理念，并在苏俄的帮助下，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的若干原则基本一致，这就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而共、青虽都以帝国主义和军阀作为革命对象，但两党在革命策略问题上却截然对立。中共主张“联俄”以推翻帝国主义，苏俄是其联合对象；青年党则将苏俄视作“赤色帝国主义”，当然也就成为他们的革命对象。这种在策略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双方失去了合作基础。

在合作方式上，国共两党采取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合作，而青年党却担心党内合作会使其“失却光明态度”，失去党的独立性，从而主张与国、共只能进行党外合作。这种在合作方式上的认识歧异也导致共、青进行合作的愿望最终落空。

纵观国民革命时期共、青两党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到：苏俄因素贯穿始终。虽然没有材料可以证明苏俄直接决定了中共对青年党政策的制定，但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共，无疑在意识形态、组织建设、政策制定方面受到了苏俄的强有力影响。事实上，国民党的改组，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及国共合作的破裂都与苏俄息息相关。按理，中共与青年党关系的发展走向也离不开苏俄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型政党的产生、发展以及彼此关系的演变，都与苏俄存在割不断的关联。苏俄在当时中国政治发展中地位的凸显，一方面表明苏俄国家实力不断强大，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党乃至政治发展中影响极大的一个国际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具体内涵开始发生内部转移，即由“欧风美雨”逐渐转向了“以俄为师”，而中国

各政党，尤其是中共与苏俄关系的历史演变由此也拉开了序幕。

对中共与青年党关系演变的历史由表及里进行剖析，可以看到：两党由寻求合作到全面对抗，“主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主义”之所以关键，在于五四之后传统儒家的官方地位崩溃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权威真空需要填补。因此，以“主义立党”的两党就必然要以“主义”为基本依凭展开竞争，确立意识形态权威地位，夺取革命的话语权，并树立政治合法性。因为意识形态具有天然排他性，所以，共、青缘于不同意识形态所形成的革命策略也难以调和。青年党不愿响应中共号召而采取“不行动”，中共将青年党定为“反革命”政党，都是各自意识形态逻辑推演的现实政策。需要注意的是，革命的日趋激进化也是共、青关系恶化的重要时代因素。一方面，新兴革命型政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使革命被建构为一种与政治合法性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一方面，不同政党基于各自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的考量，争相对革命做出扬己抑他的诠释，导致革命话语的日益专断性与革命渐趋激进化。随着革命的不断激进化，政党间的差异愈发难以弥合。在这一过程中，政党正常的竞争演化为非此即彼的角逐，手段也日益由舆论上升为武力。合作自然无望，全面对抗也就在所难免。

可以说，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青年党关系由合作到对抗的演变，为之后两党关系定下了基调。抗战胜利后，青年党在强势的国共两党格局下，最终选择了国民党阵营，或可从这一时期寻找出些许迹象。另外，中共对青年党的阶级定位，也基本形成于这一时期，中共此后对青年党的批判及回顾，也大体以这一阶级定位为着力点，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两党早期合作的努力和历史。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所关注，并着力挖掘，以探求对历史的丰满和完善。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2010级博士生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王志刚）